课外培训班的现状：

现状1，课外培训市场火爆，收入可观

随着家长对子女教育差异化需求的日渐增加，我国课外补习机构的根系日益壮大，市场异常火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规模估计在700万到850万之间。

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是什么概念？回顾2015年我国各省财政收入，全年财政收入最高的是广东省，9364.76亿元，江苏、山东分别以8028.59亿元、5529.3亿元位列二三位。也就是说，我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已经与一个发达省份全年的财政收入相当。

而支持这一庞大市场的是可观的学生数量。目前我国中小学阶段在校生总数稳定在1.8亿至2亿左右，而参加中小学辅导机构的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以2014年为例，我国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更是高达70%”。而除了实体培训机构的可观是收入外，处于政府监管边缘的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已达到1.44亿，手机教育用户规模为1.2亿，在这部分的人群中，更是囊括了婴幼儿的教育培训。

现状2，课外托管和培训机构缺良莠不齐，缺乏规范监管。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校外教育培训满足了广大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是对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和拓展，但目前的情况是，课外培训机构乱象丛生，安全隐患、办学资质、师资质量、诚信危机等成为横亘在部分培训机构发展道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

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没有自己的培训场所，大多是临时租用的写字楼或店铺，甚至有的是租用的住宅民房或地下室，存在消防、食品卫生、交通等安全隐患；大量的培训机构无证经营，缺乏合法的办学资质，缺乏必要的市场监管。

我国对课外辅导机构有明确的要求：培训机构必须有证有照经营。可是，现实中这种有证有照的监管方式反而导致大量监管之外的情况发生。目前很多课外辅导机构只是经过工商部门登记，并不归教育部门管理，教育部门对此类辅导机构没有行政执法权。比如，有的培训机构只有营业执照没有办学许可证，在这种有照无证的情况下，机构会首先办理教育咨询的工商营业执照，之后再扩大经营范围，开展教育培训等超出经营范围的业务营业执照的经。再比如，有些培训机构既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办学许可证，属于无证无照经营。按理来说，无证无照机构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与无证有照相比，无证无照的情节更严重，但是在现实中无证无照反而处于监管之外。教育部门认为这种机构未办理办学许可证不归教育部门管理，工商管理部门认为也不应该纳入他们的管理范畴，结果就是此类机构长期处于欠缺监管的状态。

大量的培训机构教师无从业资质：一些培训机构所宣称的“名师”们，很多没有取得教师从业资格，有的甚至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辅导班一边宣传其100%全职专业名师，但是另一边还在大学校园内招兼职；就连一些大牌培训机构也曾出现过将许多应届毕业生被培训老师包装成“教学经验丰富”的名师，并对外宣称“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新老师”、“没证书也说自己有”；国内多家培训机构的外教属无证上岗，有的甚至是机构包装而来，不管有没有教学资质或经验，“只要有一张金发碧眼的脸，都能成为外教”。

另外，课外培训机构的老师师资流动性大，学生的上课质量难以保证。培训班的收费虽然很高，但给刚上岗老师的工资却并不高，而等这些刚上岗的老师工作几年，有了工作经验，即使培训机构给涨工资，他们也不满足于当前的工资，大多都转为自己开培训班，所以培训班的师资流动性很大，很难全面跟踪学生的全程学习指导。

培训机构乱收费收费高也是普遍现象，超九成的培训机构预付费周期都超过一年，且预付费用普遍在2万元左右。如此长时间的培训时间，中间要是不想学了，培训机构通常的做法是，上课一个月之内退费要折价，上课超一个月将无法退费；有的有“名师”加持的高加班不仅收费高昂，还通常设置“一次性付清，现金结算，谢绝议价”之类的门槛；但由于监管部门没有对校外培训机构设置资金方面的监管，有的培训机构收钱后不作为，关门倒闭，跑路的现象时有发生，消费者退费难、维权难。

现状3，课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正在绑架学校教育。

目前，我国还没有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进行明确限制。许多国家明确禁止超前教育，并且出台了《超前教育体系法》。比如，孩子上小学三年级，就不能培训七年级的内容，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教育体系。我国已出台了学前教育‘去小学化’的规定，但在落实上还是流于形式。

如今，超前补习已经成了课外补习的基本模式，机构实施超过课程标准和学校进度的学科教育，即“抢跑”或“提前教学”，而课堂教学主要采取解题、做题、刷题的“应试教育”模式。以北京为例，培训机构建立了系统的择优体系，而择优体系主要依靠其“超常体系”，即五年级学完小学课程，六年级以复习和准备“小升初”为主；而在一些对学龄前儿童“幼小衔接”的暑期课程中，数学的难度甚至已达到小学三年级的程度。这样学校里教的内容，大部分孩子在辅导班里全学完了，所以老师就越讲越快，甚至不讲了，这样孩子就更要去上辅导班，没有上辅导班的孩子在课堂上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进度，也被迫不得不去上辅导班。而且不能只让孩子自己学，家长一定要督促、陪同孩子，因为辅导班只有短短的2个小时，不可能全部在课上吸收，所以回到家还要复习。

这些课外培训机构无视正规学校的教学进度和孩子的认知规律，通过高强度的强化训练提供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这种培训或许能在短期内带来机械式的知识增长，但难以促进深度学习，更别提促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了，甚至还有可能造成长期的伤害。

当前补习机构绑架学校教育的行为远比想象的严重，超前教学打乱了学校原本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得学校不得不更改自己的教学计划，乃至冲击了整个国民的教育体系。

补习班缘何被追捧？为什么家长们一边喊累，一边加紧报班？

校外培训机构能迅速蔓延，疯狂成长必定有它的生存土壤，因为存在即是合理的。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教育自身的问题，毕竟校外培训的壮大是当前教育体系存在问题的一个影子，它与课堂教学如影随形。

外部原因：

1. 从政治大环境看，现阶段城镇学校发展的不平衡性，交际之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诱发了择校等教育竞争行为，从而形成课外补习的土壤。中国教育的几十年，一直存在着重点与非重点，优质与非优质学校的区别。谁都知道，优质学校毕业就意味着上好大学，而上好大学就意味着能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及将来的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但由于“教育资源均等化”并没有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控制在少部分学校手里，而每个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优质学校，而规规矩矩实施“减负”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好的初高中学习。所以，学生和家长都卯足了劲，要进入到一个优质学校。

而优质学校的“小升初”录取以及评价学生优秀与否的标准就是“分数”、“特长”、“超长”。家长们为了提高孩子的分数，增加孩子的特长，能把孩子送进优质学校，不得不惜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把孩子送入补习班来换取短期分数的快速提升，以帮助其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取得成功，这种对于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让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赢在“起跑线”上成了诸多家长内心的一颗“定心丸”。

2，文化因素是加速课外补习班迅速生长的助推器。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家长来说，去补习班无异于“花钱买罪受”，但即便如此仍然抵消不了家长们的热情。

而这种热情的来源，首先就是中国对教育的重视。全世界像中国一样如此重视子女教育的国家其实并不多，而且多数都是东亚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有重教传统，“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等观念更是代代相传、深植民心。

台北南阳街被称为“补习一条街”。

美国作家何伟在《寻路中国》中说：“（在中国）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孩子的读书不抱希望的父母亲。这跟美国有所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曾写到：“在美国，华裔的学习负担也是最重的，唐人街上辅导班比比皆是，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纽约400余家备考中心，超过1/4都是过去四年出现的，1/2分布于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尤其是法拉盛和日落公园——这些都是著名的华裔区。”

而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对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2017全国中小学生课外培训调查》显示，47.13%家长在培训费投入为5001-20000元，语数外等主科类补习班培训班成为主流，而初高中阶段舞蹈、绘画等艺术特长补习价格更为惊人，一课时小则500，大则上千。

由此可见，在大环境下家长的教育观念依然是最本质的驱动力之一，虽然当下家长的教育理念已然今非昔比，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但“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依然是多数家长的选择。

3，一刀切减负令的出台是催生课外辅导班野蛮生长的客观原因。

为了孩子能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几十年来，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减负是继续治理应试教育之后，教育部门持续不断地强调的教育大方针之一。但是，政府殚精竭虑的减负政策，却不断遭到一些家长的反对。这是因为在减负上，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减负虽然说得是减去多余的学业负担、心理负担，但一些地方做的太过，做成了全部减，必须减，必须放松没有负担。一些地方更是非常夸张，出现无限放大的做法，甚至要求取消正常的期末期中考试，即便搞期末考试，也不能出成绩，称之为“乐考”。

中国家长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极其重视，多数有着超高的期望，这种减负的做法必然招致一部分有更高追求家长的反对。伴随对孩子教育的高期望，无论正确与否，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这边压下去了，那边就长出来了。近年，伴随政府对学校强力的减负措施，学习负担大规模向课外辅导班转移，形成了所谓的课内减下来，课外加上去，客观上造成了课外辅导机构风光无限。由于对合理的负担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不给课内机会，课内就转课外。更重要的是，课内转课外，是需要经济支撑的。从另一个维度看，这种减负，实际上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这的确是我们的减负政策之前所没有料到的，将来也需要考虑的。

就这样许多学生校内的负担逐步减轻，却在校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家长和孩子走进了“迷宫”，沉浮期间，无法自拔。一到周末孩子就奔忙于各种辅导班、衔接班、提分班、艺术班的路上，家长走在送孩子进辅导班的路上。这已经成为周末的一大景观。一个孩子周末上五六个培训班已是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减负令的三点半放学政策则直接驱动了众多无力接送孩子的家长将孩子送进补习班和托管班。

为推进教育减负，不少地区小学放学时间提前到三点半左右，且不说此举措减负效果如何，却实实在在地给正在上班的家长增加了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何接送孩子成了一个很难找到满意答案的难题：一来请假接送孩子不现实，二来家中老人经不起长时间的折腾，三来托管机构良莠不齐、且花费不小。可是，在学校不“接招”的情况下，家长还是会无奈地把孩子送去培训班继续补习功课。如此一看，三点半放学，孩子非但没有减负，反而学业、课业更加繁重，家长忙里忙外焦头烂额，似乎，最终只有学校的老师真正“减负”。

4. 教育评价制度的单一是导致“补习班盛行”的罪魁祸首。虽然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强调高考改革和综合评价改革，但如果深入分析，这样的改革依然没有触及到单一评价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依然是有分数在评价学生。这样的评价机制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基础教育阶段，所有的学生都站在同一跑道上，那么家长的焦虑永远不会得到缓解，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跑到前面。在他看来，如果不改变评价制度，那么减轻课外补习负担也终将成为一纸空谈。因为在升学考试时，就算评语再好，也不能超越比他高一分的学生，总体来说，还是成绩和排名。在应试这根指挥棒下，家长们面对着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和分布不足的双重焦虑，孩子们面临着文化成绩、爱好特长等多种标准的考核，害怕输在起跑线上，造成了还孩子一个轻松童年的“减负”，沦为了口号和空谈。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成绩存在压力和焦虑，这种焦虑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评价陈疾。

应试教育并没有错，每个国家都有应试教育，美国的孩子从小立志上哈佛，连暑假都要不做义工，应试教育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有没有提供应试教育之外的其他的向上的通道。这才是问题。

这种不健康的生态是由公办学校、培训机构、民办学校、家长、地方政府等不同的利益主体共同催生的。

5. 教育自身的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与我们的学校教育如影随形，被称为“影子教育”。校外培训机构能迅速蔓延，疯狂成长直接反应了我们当前教育体系的问题。

1. 教师课外有偿补课。

公办学校校长讲得最多的是“我们减负，家长加负担”。可是，学校是不是完全无辜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在教育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很多公办学校教师进行有偿补课，数据是惊人的。

调查显示，公司、机构举办的辅导班只占学生所上辅导班的20%左右，而公办学校老师小范围的办班大量存在。他们并不是去培训机构兼职，而是自己在家里补课。

这个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恶化了师生关系。一些老师在外面补课工作量很大，课堂上敷衍了事，吸引学生参加补课。

虽然政府反复强调不能有偿补课，但是实际监管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有学校因为私下补课而开除老师的。

（2）名校效应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热衷于建设“重点学校”，搞“掐尖”式教育，客观上一直在制造学校差距，许多学校明面上不择校，实际上偷偷摸摸选拔学生，在追求升学率、排名等“教育GDP”的集体行为中，地方政府、名校、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了阻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利益集团。

我们知道 “华罗庚杯”从鼓励孩子学习的初衷，变成“令人痛恨”的学业负担，是有一个转折点的，这个转折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教育生态改变的标志。

这个时间点是1998年，当时北京一所高校附中举行小学奥数比赛。

此前奥数是一个面向少数儿童的学科竞赛，这个学校办班则是从全北京小学生中筛选，通过一轮轮筛选的学生，可以进入该校初中。这个名校就是通过这个班，获得了“第一桶金”。

当时推行义务教育法，各个学校都不能通过筛选招生了，只有这个学校还在大范围地筛选学生。

所以，这个学校的升学率奇迹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随后，多所中学都开始办比赛招生，逐渐蔓延到其他学校。长达20年左右的残酷竞争蔓延开来。

这些年，关于各种竞赛都反反复复地禁止，但是很难真正地杜绝。

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资本在教育领域快速聚集，推波助澜；另一方面，校外培训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其中有名校利益在作祟。

好未来的主要收入来自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高年级阶段的培训。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了升学考试，大家都想上好学校，但是好学校又想招好学生，于是各种占坑班、各种特长班、各种竞赛班，比比皆是，无形中增添了更多的负担。

（3）民办学校

通过校外培训来助力升学是大部分家长需求的主要动因。尽管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施就进免试入学，但仍有部分优质的民办学校有着选拔学生的机会，家长对此部分民办学校的需求较大，竞争也教激烈。有家长表示：“如果要选择民办初中的话，裸考成功的几率太低了，不敢去赌，唯有乖乖地跟紧培训机构的步伐”。有校长直言：民办学校靠培训机构选拔优质生源，这是公开的秘密。

一位教育业内人士说，2014年开始，杭州民办初中自主招生比例从30%增加到现在的40%，给民办初中带来了深远影响。因为60%名额要无条件摇号，招进来的学生质量不能保证，民办初中想尽办法，保证40%的自主招生生源绝对优秀。民办初中自主招生的门槛也因此比以前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杭州很多培训机构，对学生分快慢班，进行各种测试，为民办初中掐尖当好“帮手”。 曾经有家长说：我的孩子在一所普通公办小学读书，成绩是全校数一数二的，当时不少家长都在培训机构，我没有去凑这个热闹，觉得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更加重要。到了去年下半年，孩子六年级上学期时，我加入了那种小升初的家长群，才明白了原来小升初有那么多门道，不参加培训机构，根本进入不了“四大杯赛”的培训圈，没有杯赛成绩，想上民办初中很难很难。

（3）当前教育系统内部没有提供做够多的、满足孩子多样化教育需求的供给，而学校教育形式的单一与升学考试的多重标准又相互矛盾。而规范的培训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追求和公立学校难以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家长们看来，培训机构的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研，加上没有学校老师那么多的行政事务，培训机构的老师可以更加专心于教学，同时机构内的淘汰制也让老师们不敢松懈。作为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去提分，以冲刺名校。不少老师觉得，公办学校里，一个班四五十人，不利于分层教学。老师每天都忙得像打仗，根本无暇顾及，有时候只能“一刀切”。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把部分学生推向了校外培训机构。

因为严格从教育本意来说，家长们当然愿意按照素质教育的路径，让孩子快乐成长，不过在“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标准下，家长和孩子已然被深度绑架，做着言不由衷的行为选择。

所以教育体系问题越多，校外培训机构的数量就会越大。这种畸形的现象背后，既有家长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也有教育培训机构与学校教育的利益链条从中作祟。

措施和手段：

1. 在最关键的环节发力，即通过公办学校的均衡消除择校冲动。首先，要承认学校之间有差距，“择校”热宜疏不宜堵。比如，北京和上海经过义务教育均衡验收，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一个学区里，只要有一所比较差，家长还是会择校，所以如果有薄弱校，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定点解决问题。在教育功能的价值引导上，兼顾大众化和多样化，以教育公平为底线，真正将“育人”作为核心追求。
2. 把切断培训成果和中小学升学之间的联系作为重中之重。其实，教育部门如果动真格，敢于“刮骨疗伤”，排除一些利益干扰，进而查处一批学校，查处一批老师，哪怕只有它一个部门管理，也可以管得好的。只要严守明规则，枪打出头鸟，就不会出现“管不住”的情况。
3. 对培训机构建立严格的制度标准不应降太低

今年四月以来，广州开展了5次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对于整治行动，明师教育董事、执行总裁胡彬彬持赞成态度。他表示：“合规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他认为，严格的制度实际上更便于管理，“先从严”是一个好的做法，相关标准不应降得太低。只要提高了开店成本和违规成本，如要求培训机构一定要有两个消防疏散通道，危险系数就会有所降低，机构卷款潜逃的几率也会下降。他强调，要求培训机构合规就一定要有明确的章程，只有有章可依，有明确的指引，培训机构才能由上往下去贯彻和执行。

在谈到减负问题时，胡彬彬表示，广州开展的这一系列整治行动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培训机构，并非完全取缔培训机构的存在。只要还有升学的制度，学生就会有压力，有压力就有动力，也就随之衍生出了补习的需求。

胡彬彬认为，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学生学习的起点也相应地提高了，只要学生参加补习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了“把不懂变成懂”，提高学习能力，就是合理的。

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无法做到一蹴而就，改革的代价也无法由个体来承担。因为在大环境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依托于个体的努力并不现实。如果说“拼娃”的选择是基于现实需求的满足，那么就必须有供给侧维度的改革，通过供给的调整和变化，从而带动需求的改变。否则，只有需求侧的指责而无供给侧的呼应，那么“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拼娃”，就会导致言行的颠倒与反置。故而从长远来看，只有教育发展更加均衡了，社会发展更加多元了，成功的标准不再单一，这类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减负不能止于课堂。减负关键在实效，课业减下来的同时，课余也要充实起来。比如近年来笔者所在的社区，开办了假日学校，让孩子有一个学习的好去处。唯有加强家校联动，凝聚社会合力，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才是真的减负。

目前我们国家没有相关的政策，这是可以考虑改善的。我们现在很多政策都是“一刀切”，比如应对择校热，就简单地把择校需求压制住。

我记得以前鼓励民办学校发展，有一句话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

现在看，民办学校办起来了，但是一些公办学校水平下降。

公办和民办基础教育质量产生分野，把所谓的“阶级分层”强化了，这个已经背离了基础教育的价值，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

如何改善公办学校品质，处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关系成为一个新课题。

**赵琬微：**如今，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升级。在对教育功能的价值认同上，我们国家所倡导的教育价值理念与具体实践似乎长期存在“两张皮”现象，“让教育回归原点”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呼声。

现代化的教育治理，需要改变这种应然和实然相互割裂的状态，

**需进一步明确民校自主招生方式**

如何更好地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广州某重点民校负责人认为，应该找出问题根源所在，其中，招生方式的分歧是关键所在。根据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家应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义务教育法》又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是实施“免试”的原则。如何免试？怎么体现民校的自主办学？他建议，由于《义务教育法》是上位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必须“顺从”上位法。因此，两者的抵触之处以《义务教育法》为准。但《义务教育法》又无法解决民校在招生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建议在《义务教育法》中再细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基于办学资金的来源不同，这样的细分更符合实际情况。

谈到“密考”问题时，该负责人建议统一民办学校的招生时间。如规定在小学毕业考后的某一天上午举行，当天上午9：00-12：00是民办学校招生时间，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水平和喜好去参加民办学校的选拔，一来让学生可以精准定位自己，二来也有一定的随机性，这样相对而言比较公平。同时，也可建立一个投诉平台，只要发现有学校“偷步”提前招生就可在平台上投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三、措施：

课后托管应允许第三方机构进校提供服务

北京市教委发布实施《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近4个月。原则上学校每天在完成规定课时之后提供课后服务，时间到下午5点30分，具体时间由各区、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为学生提供课后托管服务，包括提供场地条件和管理服务，学生自主安排户外活动、校内阅读、自习、做作业等活动……

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尽管有了指导意见，但是学校提供的课后托管服务仍然无法满足家长的高需求。对此，不少市政协委员为学校课后托管服务开出“药方”。

药方一：关于托管老师

增加经费让参与的教师有获得感

“现在政府的经费投入核算下来每名学生每月仅38元，平均到每位老师，一节课的补贴不足100元，这种标准远低于市场价格。”市政协委员、芳草地国际学校校长刘飞提到，目前在校教师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再让教师增加工作时长，在校教师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如果能够有足够的经费，一些可以参与的教师加入其中也能有获得感。

刘飞表示，要满足家长的托管需求，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经费作为保障，让学校能够有能力、有意愿承担课后托管责任教师费用的成本。

药方二：关于托管内容

允许第三方机构进校提供内容服务

课后服务指导意见出台之后，不少家长表示，学校课后托管的内容并没有预期的那么丰富。

对此，刘飞认为，相关的文件中没有清晰界定课后托管的具体内容，以致家长对学校课后托管有了更高的心理期待。“政府应该将课后辅导的内容明确，消除家长们对课后托管服务的误解。”

刘飞还提出：“政府满足基本需求，一些额外的特殊需求请第三方正规的校外培训机构来完成，满足不同的需求。比如，学校负责学生到下午5点半的托管工作，5点半之后的托管工作就可以请合规的校外培训机构介入。”

“学校可以跟监管到位、具备办学资质的校外托管机构进行交接，家长通过委托学校的方式，请学校‘手递手’将学生送到第三方机构中进行后续的课后托管和个性化特长辅导，也可以通过学校移交权责的方式，请正规机构进入学校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服务，学校可以提供免费场地。”刘飞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定要加强对第三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保质保安全。

药方三：关于托管费用

家长可以适当分担个性化辅导费用

“各个学校的课后服务都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但各校的补贴都一样，能不能在课后服务上分类处理，仅看管费用由政府负担，如果学生还想发展特长，那么家长应该多分担一些。” 市政协委员、中关村三小校长刘可钦说。

刘可钦表示，目前政策不允许在学校内开展收费特长培训服务，可是如果学生参加课外兴趣班，收费会更贵。希望在制度上能够有一些创新，依靠政府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利用课后托管时间发展学生兴趣，但同时家长也可合理分担一些费用。

“学校的收费在一定程度上比培训机构收费是要低一些的，相对来讲学生在学校活动也是比较安全的。”市政协委员、黄城根小学校长麦峰认为，政府买单满足“双职工”家庭接孩子难的问题，做的是保底线的工作，就是安全地将学生托管到下午5点半。对于家长和孩子的个性化需求，学校可以适当收取费用。

其实应该是在最关键的环节发力，即通过公办学校的均衡消除择校冲动。

**赵琬微：**除了“堵”课外培训和择校冲动，一些国家也有面向弱势学生、后进学生的“补救教育”。

如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开端计划”和“每一个学生成功法”等，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经验，利用公共财政向贫困等弱势家庭倾斜，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课外教育指导。

**杨东平：**在国外，学生离校的时间的确很早，国外有很多家庭是全职主妇。而国内双职工为主的情况下，学校承担课后服务的功能，毫无疑问是应该的。

过去很多学校设置了灵活的接送时间，现在规定到17点，很多家庭还是无法兼顾。

前几年，以治理乱收费为由，把课后服务取消。现在如果要增加学校的课后服务，则是下一轮改革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一种社会需求，要因地制宜采取措施。

要坚持义务教育的价值，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办学，才能正本清源，重新引导价值的认同，真正攻克学业负担这一顽症。

解决办法:

补习减负，管理和观念并行

他认为解决课外补习过热乱象之根本还要借助政府的手腕，依靠政府监管来维系一个相对公正的教育环境。

课外补习因为相伴着学校教育而生，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一直以来被称为 “影子教育”，在杨东平看来，如果学校教育改善了，课外补习生存的土壤也就失去了。他建议国家应该重点提升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

薛海平认为，学校可以不拘泥于应试课堂的单一形式，推广多样化教育，在学生培养目标和课程设计、教学方式上走多元化道路，以满足学生和家长对于教育个性化的需求。

近期，北京、上海等地相继出台的小学“3点半”放学的规定，有一些家长因为无力接送孩子只能将孩子送到补习班这类托管班，变相助长了补习热。针对这一现象，各地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比如上海规定中小学校后服务要做到百分之百全覆盖，服务的时间是3点半到5点，参与这项服务的老师在效益工资方面给予倾斜；而北京规定3点到5点期间是校后服务时间，主要内容是开展课外活动，每个学生每年补助700-900元。

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课外负担，改革评价体系是釜底抽薪之策，但这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现有的大环境下，熊丙奇认为可以借鉴他山之石。

比如在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实施宽松教育，一星期只上五天课，结果导致很多学生利用双休日的时间去校外补课。在经过各方权衡之后，日本的一些学校重新选择了一周上六天课，以此来减少学生去课外补习机构的机会，最终这一方式被推广到了全国。日方经过评估发现，一周上六天课后，学生的负担比原来上五天课时的负担减轻了。

“在整体的大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日本的学校就通过提升教学质量，改变教学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基于现状所做的一种合理的选择。”熊丙奇强调。

除去政府和学校的作为，身为补课的庞大受众群体，家长的教育观念同样值得进行适度转变。

虽然补习班的盛行存在诸多外部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大环境下家长的焦虑心态依然是最本质的驱动力之一，虽然当下家长的教育理念已然今非昔比，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但“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依然是多数家长的选择。

回归到教育本身，这样的追逐值得深思。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名誉教授赵勇看来，未来社会所要求的每个人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意味着教育应该多“扬长”，而非“补短”，因为看似每个阶段标准化的“完美”并不意味他在将来社会就一定能够成功。

从长远上看，中国基础阶段的评价方式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着，整体的教育目标已经由“双基”向“学生核心素养”转变。

薛海平建议每个家长能够保持一种更为冷静理性的心态，“人生毕竟不是一场百米赛跑，而更像一场马拉松，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保留住他对学习和知识的热情才是最关键的事。”

解决问题，从深化供给侧改革开始

【进展】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教育部要求各地集中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截至8月20日，全国已摸排培训机构38.2万家，其中发现问题25.9万家，已经整改4.5万家。

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构建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总体制度框架。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务求今年年底全面完成整改。

随着校外培训机构迅速扩张，相关问题和风险加剧也是事实。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中，证照齐全的比例不足20%。很多机构存在着教学质量没有保障、定价随意而混乱，聘用教师无资质、教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为整治校外培训野蛮生长现状，各地都在积极行动，边摸排边整治，“奇招”不少：微信举报、鼓励民众监督、建立管理平台、黑白名单制度……

不过，在拥有大量资本注入、更有数以万计“起跑线恐慌”的家长支持的情况下，如何让整改后的校外培训机构坚守红线?

从治标看，能否实现应管尽管很重要。目前，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由教育、民政、工商部门多头发放，谁是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主体并不清晰，容易导致监管缺位。因此，需要在做好部门协同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社会力量参与治理。

老师、家长在引导孩子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李小若建议，当前给学生减负的核心是教会学生思考自己人生和未来的方向。这需要老师、家长更多地与孩子沟通，让孩子知道怎么学，“这比上多少课外辅导班、加大作业量、不停地考试都更有效果”。

从根本上说，由于当前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无限大，教育供给又没做好，才造成供需矛盾突出。

薛二勇认为，教育供给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现实原因，父母需要工作，学校课堂时间严格控制，学生们放学后只能到校外培训机构。其次，当前教育系统内部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满足孩子多样化教育需求的供给。第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成绩存在压力和焦虑，这种焦虑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评价陈疾。此外，一些培训机构本身在开展针对性教学、提高孩子成绩方面有创新、有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家长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的需求。

“校外培训壮大是当前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的一个影子。”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记者表示，当教育体系能把正常的教育功能包纳其中，就没有必要产生很多培训机构。这个体系问题越多，校外培训机构的体量就越大。

他认为，现在教育体系在管理和评价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考试分数功能被异化，学校发展不均衡，分数成为进入好学校的主要标准。这些都导致大部分学生为了提升分数而选择报课外班。

“完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要从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开始。”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对记者表示，一个和谐的、严格的教育体系应该是以学校教育为主、校外教育为辅的相辅相成关系。这需要二者共同努力，完善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评价体系，同时引领好教育文化和社会风气。

原因：

原因:有两大因素助长了课外辅导班的风气：一是在幼升小、小升初等考试招生过程中，过度关注“特长”、“超常”等因素，导致一部分学生拔苗助长，通过课外辅导班快速扩大知识面并提高成绩；二是一部分校内的老师在校外辅导班兼职，对于班级的同学上课外辅导班多有鼓励，无形之中助长了孩子们校外加课的风气。足见，校外辅导班的盛行，根源在校内。正是由于招生制度不科学、人才选拔机制不合理、应试教育的痕迹过重，才给校外辅导班以生存空间。

我的想法：

考虑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培训？

借鉴德国

教师应提高自身素质，不得在外授课，借鉴新加坡

中小学要效仿高中，或德国实施6分制度，无特长招生

借鉴美国，学校和社区共同合作，

课后托管应允许第三方机构进校提供服务

t